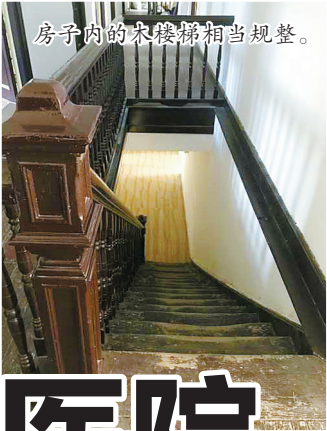




时光深处的鄞奉公益医院

古迹

水草

目前，宁波市第一医院异地建设一期项目在奉化方桥如火如荼进行中，期盼之余，我不由得想起了百年前曾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另一家医院——鄞奉公益医院。

奉化方桥东江之畔，静静矗立着一幢两层楼洋房。简约的砖石门楼，磨石子的方柱，方柱上端和天花板四周的石膏雕花，走廊上精美的铁栅栏，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民国风情。这是昔日鄞奉公益医院留存至今的部分建筑。

西方医学从最初作为传教士援助民众的手段，到生根于中国大地，成为国民生活的组成部分，归功于西医院的创立和普及。20世纪上半叶，奉化与国内其他开化之地一样，开始与时代接轨，创办西医院。1918年旧历五月二十日，时任鄞县大嵩盐场场长的奉化方桥乡后江村人江西溟在方桥发起募建了鄞奉公益医院，成为奉化县第二家西医院，也是宁波近代声望颇著的慈善医院。

方桥地处鄞奉交界，为当时水陆要冲，剡江、县江、东江三江在此汇流，下游抵宁波、舟山，上游连新昌、嵊县等地，交通便利。创院之初，院址在桥亭

南侧原方桥乡公所内。乡公所有前进平房、后进两层楼和东西厢房，医院只利用前进平房。1919年正月，医院召开落成大会，会稽道尹黄涵之出席，江西溟恳请道尹代为筹款。1921年6月，黄道尹邀请沪商界和财政界风云人物、定海籍朱葆三等30余人在上海开会筹款，获捐5100余银圆。

1922年，江西溟等人又在甬、沪等地募得善款3万余元，在江北岸建造一幢五开间两层洋房。1930年春，在洋房之东又建一幢五间两弄两厢房的两层洋房，历时8个月，耗银2.5万两，医疗条件大为改观。人们按两座洋房建筑时间的先后，分别称为“老洋房”“新洋房”。

鄞奉公益医院突破了医疗地域上的界限，将医疗服务对象定位于鄞、奉两县周边民众。日常经费主要由医院董事募集，凡是热心公益的乡望素孚，均可公推为董事。经费不足部分由两地政府负担。1919年，董事达240之众。1932年，医院投资2500银圆，购置12马力柴油机和德国产10千瓦发电机各1台，在距医院200米处的江畔南侧龙王堂独资创办了发电厂。初期，专供医院用电。1934年1月起，对外营业，供应商店照明用电。医院的创新精神以及前瞻性和魄力，在当时为全国少见。

院房从西到东，分别为乡公

所、老洋房、新洋房。两座洋房二楼之间用一座3间屋面长的天桥相连。为方便患者出行，在老方桥北桥头乡公所门口，建了一道宽阔、平坦的石台阶。沿台阶而下，是一条连接各院楼的東西向甬道。甬道之南为沿江公园，草木茂盛。公园南临东江，有西坞至宁波外滩河码头的客轮经过。从医院南侧的八角亭环顾四周，风景如画。

新洋房东边有食堂、轿房、马房、仓库等辅房，场地宽敞。医生陆上出诊，或乘马车，或坐轿子。人民公社时期，辅房被拆，建了人民大会堂。如今，人民大会堂已夷为平地。老洋房、天桥、八角亭也于2014年春被拆。

鄞奉公益医院成立之初，有医务人员10余人，医院配有当时宁波罕见的生物显微镜等医疗设备。院长兼医长王科功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医科，日本籍产科妇科主任山县女士曾就学于日本仙台注射医院。据年已98岁的马绪坤老人回忆，在他10多岁时，当时的院长兼眼科主任宋静轩医师医术高超，上海等地许多眼疾患者专程坐船到方桥来诊治。1940年，医院开始做截肢手术，标志着医术水平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1965年，方桥卫生所医务人员从乡公所旧址中清理出鄞奉公益医院的旧物，其中就有10多只用福尔马林浸泡畸形婴儿标本的大口

瓶。可见，当年医院已对畸形儿进行医学研究。

为了百姓健康，1919年正月二十至三月末，医院每逢一四八日施种牛痘，第一期种痘230余人。当年7月起，每逢四八日只收挂号费，免药费。患者纷纷前往，门诊日挂号有七八十人，住院人数也有所增多。此后，每年春季免费施种牛痘成为惯例。1921年起，每日上午门诊免收药费。据统计，当年医院日均门诊为23人，住院为15人。

在动荡的年代里，医院历经沧桑。1941年春，奉化沦陷，电厂、医院均被汪伪军侵占，医院陷入瘫痪，设备损坏严重。次年方恢复营业。

1951年6月，奉化县卫生院接收鄞奉公益医院，老洋房成为方桥乡卫生所，新洋房成为方桥公社政府办公楼，乡公所进驻了邮电所、粮站。从此，鄞奉公益医院退出历史舞台。

时至今日，鄞奉公益医院留存下来的新洋房建筑，已变身厂房。经过三年前的一次装修，虽然木窗棂内的彩色玻璃已被卸下，暗淡的磨石子地面换成了光亮的地砖，但狭长的木楼梯、规整的木地板、精美的铁栅栏依旧守候着老房子，高高的挑檐大阳台仍遥望着远方。

鄞奉公益医院的那段历史渐行渐远，但我仍感受到它曾经带给鄞奉大地的光和热。

慢时光

沈春儿

黑板是每个教室的标配，但这个“标配”具体应该按什么标准，各个年代、各个学校是不同的。

记得1977年入学余姚郑巷乡新风小学（原名朱九郎庙小学），全校两个班级，两个教室，分别是一三、二四复式班。教室里所谓的黑板，是木板刷上黑漆，年深日久，木板与木板之间裂着可以插进去一根手指的缝隙。木黑板最大的问题是黑漆容易剥落，每个学期开学前，校长会亲自动手，在两块黑板上再刷一遍黑漆——不过，全校也就两个老师，另一个是上海女知青，姓岑。校长不动手，难道要还带着孩子的女老师去刷？

每一学期开学，我们都能开心地看到一块乌黑的新黑板。岑老师的粉笔字写上去，黑白分明，铿锵有力。可惜，每学期只能有这么一次的赏心悦目，这些黑白分明的字，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擦去个大概，第二天的黑板，已经远没有第一天干净乌黑。现在想起来，应该是木黑板的质地比较疏松，涂上黑漆后表面还是非常粗糙，导致粉笔灰难以清理干净。不超过半个学期，黑漆就从黑板边缘开始小块脱落，脱落面积随时间推移逐步扩大，有时候从远处看，似乎破烂讲台前放的是一幅神秘的藏宝图。那些脱落形成的图案，给老师的书写带来挑战。但岑老师上课的时候，对黑板的高高低低起起落落毫不在意，她会挑光滑的区域书写，有时候上一句与下一句会有跨区域的跳跃。我们则习以为常。我在似懂非懂中读完了四年级，这个学校随即被并入另一所村校，不复存在。

1988年，我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低塘区新新乡校工作。“新新”是个尴尬的地名，说它“新”，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已经基本忽略了这个地名，原来的新新乡被归入现在的朗霞街道。说它“老”，也不对，叫“新新乡”和“新新乡校”，是撤了公社后的事情，对于70后来说，“新新乡校”这个名称还比较熟悉，再老一辈的人喜欢喊“冷江小学”，现在则叫“余姚市新新乡”。

1988年的新新乡校，还在“冷江小学”的旧址，这座江南四合院式建筑，历经数十年风雨，已显破败。有的教室还留有当年的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所有教室内的黑板，是水泥黑板。上了黑漆的水泥黑板坚固耐用，就是黑漆容易发灰，时间一长，特别是阴湿天气时，粉笔字写在发灰的黑板上，混沌一片。当时粉笔质量低劣，在水泥黑板上书写的时候，粉笔常常打滑，笔画不清晰，需要一笔一笔补写。作为新教师的我，其实钢笔字写得不错，但在新新乡校工作的前几年，总觉得自己写的板书难看。于是每天放学后，我一个人在教室的黑板上练习书写。无数次写了擦，擦了写，逐渐练就了一手规范又迅速的板书。

比起写板书的艰辛，更不容易的是刻蜡纸。拿铁笔在钢板上刻蜡纸需要右手有足够的腕力，厚重的钢板上有一棱一棱的小纹理，铁笔写上去，不够用力的话，蜡纸上刻的字印出来就不够浓，甚至笔画断断续续；如果太用力或用力不当，铁笔容易跟着钢板上的纹理走，刻

那些与黑板相关的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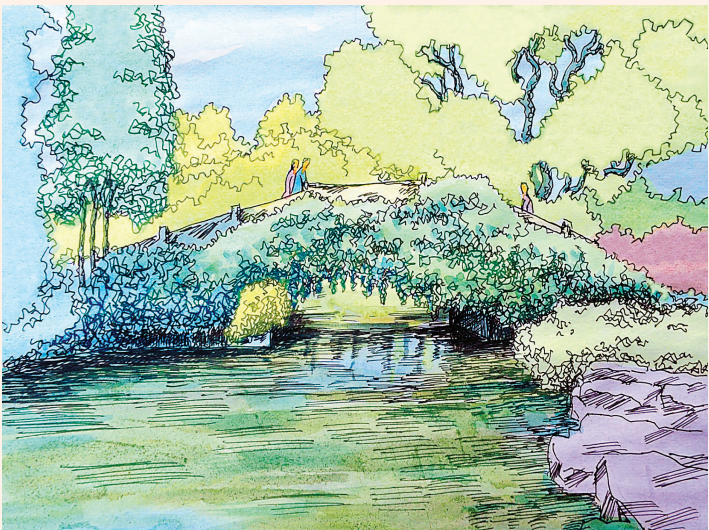
写在蜡纸上的字就变形了，甚至蜡纸破洞，印出的卷子出现油墨团，就没法使用了。当年所有的辅导资料、练习卷和试卷，都是由老师们自己刻写蜡纸、自己用油墨印刷的。纯手工印刷，很考验人的经验，油墨的分量、刷子的力度、拿起蜡纸的角度，都有讲究。一年下来，弄脏了好几件衣服的前襟、衣袖，报废了十几张蜡纸，我终于成了一名熟练的印刷工。看看现在，轻轻一点鼠标，打印机就唰唰往外吐纸，上面的文字黑白分明、细腻清晰。想起当年在钢板上刻蜡纸的往事，恍若隔世。

那时候，新新乡校有10多个班级、20多位教师。很多老师家在外乡，交通不便，于是，在这个破败的四合院里，住了两个教师家庭、几个单身中年教师，还有我们这一批1984年以后分配的普师生。回首往事，在这所学校的工作与生活经历，没让我们觉得有多么辛苦，更多的，是战胜困难后的快乐和取得成绩后的欣喜。

1991年，新新乡校搬迁到新址，新学校、新设施，黑板改成了玻璃黑板。玻璃黑板是墨绿色的，没有油漆剥落或淡化的担忧，写字轻松，擦拭容易，十分方便。

近十年来，教学设施有了质的改变与量的提升。黑板虽然依旧留存，但现代化设施在逐年递增，并不断更新换代。从一个学校只有几台电脑，到每个班级都配上电脑、连上互联网、安装升级版投影仪，再到现在更为先进的各种教学仪器，教育事业搭上了现代科技的快车。当年学校里使用的黑板、蜡纸等书写和印刷设施，差不多已进入“文物”行列。

甬城绘·古桥



月湖桥

月湖桥又名湖心东桥，区级文保单位。始建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现存建筑为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重建，为单孔石拱桥。桥洞两侧青藤飘拂，古意盎然，是海曙月湖区域内最有代表性的桥梁。

月湖原有三堤七桥之胜。七桥中，月湖桥是目前湖上按原状保存的唯一桥梁。

（丁安 绘）

名不见经传的“鹰架”师傅



①架子工正在搭毛竹“鹰架”。
②四明山区的农户用简易机器劈取“百篾”。
③牢固的钢管配实惠的“竹片”，是当今建筑业的普遍选择。

老照片

桑金伟 文/摄

造房子离不开脚手架，脚手架宁波人叫“鹰架”。《宁波方言词典》说：“鹰架：脚手架；为了建筑工人在高处操作而搭的架子。”也有写作“鹰架”的。

过去家乡建房、立契、写分书等少不了要确定房屋的四至，这就涉及“鹰架坞”“滴水”等话头。特别是农村建房时，为了争“三尺鹰架坞”，往往邻居反目、兄弟闹墙。

早年我老家的南端墙外，留出了三尺“鹰架坞”，邻居景家的北端墙外也留了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夹出了一条六尺巷。此六尺“鹰架”小弄长期闲置，只有修屋时用一下。盛夏时节，两家都打开端墙上的门乘凉，小弄里特别阴凉。邻居景家的几个女儿是慈溪有名的金嗓子，她们的歌声通过这段“回音壁”的共鸣，飘到

我的耳中，特别动听。

安徽桐城市内有条著名的六尺巷。据说康熙年间，相邻的张、叶两家建房时为争“鹰架坞”而闹出了纠纷，于是张家驰书在京为官的户主。户主回复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首“让墙诗”引出一段和谐的历史典故。后来六尺巷前竖起刻着“礼让”二字的石碑，成了一段佳话。

我插队时好友的三哥徐绍池是原慈溪市建筑公司的“鹰架”师傅，他出生于1945年，搭了38年的“鹰架”。20世纪90年代初，他参加了“应知应会”培训和考试，1993年11月领到了由宁波市劳动局颁发的《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证书上载明，他操作的项目是“架子工”——原来这就是“鹰架”师傅的现代正式名称。

早年对“鹰架”师傅的称呼有很多。《中国大百科·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说：“搭材作，

中国古代建筑工程中用木材（或竹子）支搭施工辅助设施和临时建筑的一种专业，今称‘搭架子’。工作内容是搭脚手架（供砌砖、抹灰、装饰彩画、装卸构件等工作使用）。以及吊装起重架子、打桩架子，搭席棚、布棚等。宋《营造法式》中的‘卓立搭架’就讲到施工用的脚手架。清工部《工程做法》列有‘搭材作’一节，并列出了11种架子的用工用料。搭材作的工人，古代叫‘搭材匠’。明代工役中已有‘搭材匠’一行。清内务部有‘绳子匠’‘杉篙匠’‘彩子匠’‘缙席匠’等，都是同搭材作有关的工匠，现代叫‘架子工’……”

这说明，至少在宋代建屋已搭鹰架，明代已有架子工这一行。可见，架子工也是一种老行当，可惜未收于当代出版的各种老行当书籍中，“名不见经传”。

过去搭脚手架，北方多用木材，南方多用毛竹。宁波一带有的是大毛竹，它中空、体轻，支

撑力不弱，且价廉，是很实惠的搭架料作。现在农村造民房，还在使用它。

过去捆扎脚手架的大多是绳子和麻带，而宁波一带用的是“百篾”，百篾是竹子生长了100天后的第一层皮，即“篾青”，百篾体轻而韧性好。老底子宁波的脚手架称得上是用“全竹”搭建的，这在全国并不多见。不过现在百篾已被铁丝所取代。

我幼年所见的“鹰架”师傅，常常腰系一绺2米长的百篾，像猴子一样灵活地在光溜溜的竹竿上攀爬。徐绍池师傅说：过去的架子工多由篾匠转行而来，自己也是，因为篾匠熟悉“竹性”，用竹得心应手。“我们公司原有5个鹰架师傅，眼下可能只剩我一个了。”徐师傅说，最难搭的是建烟囱的脚手架，因为烟囱“搭脚”小而体量高，又是圆形。他平生搭过最高的架子是慈溪砖瓦厂的烟囱，足足有45米高！

用中国传统方式搭的架子是以“立杆”和“顺杆”组成方格形。立杆（也称站杆、冲天、立柱）与地面垂直，其作用是将架子上的负荷垂直传到地面，间距一般在1.5米左右。顺杆（也称横杆、横楞、牵杠）与地面平行，其作用是将架子上的负荷传到立杆上并牵扯固定架子，间距1.2米为一步架。为加强架子的稳定性，另支各种“斜戗”（也称斜撑、剪刀撑等）。这是架子的基本骨干。

施工用的脚手架，为了供工人行走、操作和堆放用料，还在顺杆上再置横木，横木上又放脚手板。宁波一带脚手板常用竹片编成，叫“竹片”。“竹片”耐压、防滑、质轻、价廉，至今仍在普遍使用。

一根毛竹的使用年限通常不超过3年，百篾不过1年，为安全计，毛竹的脚手架目前已较少使用，但架子工仍是不可或缺的工种。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建筑业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要行业，其中，架子工是进城务工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来自农村，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在钢管堆里钻来钻去，在城市繁华的背后，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